

重新阅读女男的生活体验
我们就可以知道
只有既解放女人也解放男人
女男才能双双走近自由和谐相处

yuedu 阅读性别 xingbie

周华山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90204645

女性新视野丛书

yuedu xingbie

阅读性别

周华山 著



C913
1184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性别/周华山著 .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9

(女性新视野丛书)

ISBN 7-214-02563-9

I . 阅… II . 周… III . 社会学 IV . C913.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757 号

书 名 阅读性别
著 者 周华山
责任编辑 张慕贞
出版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5 插页 2
印 数 1—6135 册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563—9/G·805
定 价 11.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朋友，如果您在乎自己的生命质量，如果您留心周围男男女女的生存状态，如果您把重新审视自己的性别身份看作自我认知的重要前提，您就一定不会错过与女人的发展、与男女和谐相处、与我们今天每个人的生活处境密切相关的这三套丛书：

“女性新热点丛书”

“女性新视野丛书”

“性别论坛”

在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甚至更早一些时候，自近代维新运动以来，“女性”及其“解放”和“发展”，一直是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中国的妇女问题同中国妇女解放一样，始终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纠缠在一起。

我们曾经以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解放了，再不会有什特殊的妇女问题。我们也曾以为，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妇女的发展，而妇女的解放和进

步也必然导致男人的解放乃至整个社会观念的革新。

其实不尽然。

在中国妇女全面走上社会整整半个世纪之际，在一个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反观妇女解放进程，再看今天的现实生活，我们发现：

——妇女走上社会并不等同于妇女解放，社会生活中反倒更多了妇女问题；

——社会发展不一定同时就是妇女的发展，它甚至可能以牺牲妇女的利益为代价；

——而妇女的进步也不意味着男人和社会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它们可能恰恰是以相反的形式做出“滞后”的选择。

所有这些出乎我们意料的现象，不仅困惑着女人，也困惑着当代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男人——因为没有人能在与女人的隔绝中生活，也没有哪个男人能在对妇女发展的拒斥中成全自己的人生。女人当然更不例外，她必须在变化的世界中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在自我发展的行程中自觉推动社会发展，在完善“人”的意义上敦促男人的解放和进步。

面对新的问题，必须寻找新的答案，因此有了这三套书：

“女性新热点丛书”于 1997 年出台，正值全社会动员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突出了社会发展与妇女发展的矛盾。“妇女解放”像是失去了它原来赖以依托的背景，妇女问题一时触目，所谓“新热点”，即由此而出。这套书几乎全部出自当今正活跃在妇女学界的女性学者之手，她们将关注和同情的目光投向在社会改革中出现的女性“新生群体”（如“打工妹”）或“弱势群体”（如“单亲母亲”），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力图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性的分析透视当代妇女问题，旨在警醒世人，召唤政策投入，对社会和对女人敲响双面警钟。

“女性新视野丛书”于 1999 年面世，恰逢世纪转换之中。所谓“新视野”，是想在正视“问题”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将女性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强化自我认识，鼓励自我成长。此书的出版正值“下岗”问题突出，这种新形势下，女性的自强自立已经不尽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改变生存方式的同时，观念更新势在必行。曾经的靠国家、靠社会、靠单位、靠家庭、靠男人——都靠不住了，自助和互助反倒成为有可能尽快走出困境的捷径。怎样走出第一步？怎样在自食其力的基础上走得更远、在众多的压力下活得稍

微轻松一些？怎样将社会发展的强势转化为个人成长的优势？……这套丛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性别论坛”企图在前两套书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是我们给新世纪的一份献礼，也是我们对新世纪的一种期待，拟于2000年推出。这里所谓“性别”，主要强调两性之间的平等对话，而不只是女性（或男性）的一家之言。生活在当代，男女两性在社会上需要合作，在精神上也需要沟通和交流——只有在交流的基础上达成新的理解，男女双方的自我认识才会有所提高；必得有所提高，才可能和谐相处，在现代与历史之间架起一座跨越“性沟”的桥梁。“论坛”因此打破一般论著“一言堂”的封闭式立论结构，一家言论之中，总有他人参与；对话、访谈融于其间，切着时代进程和思想发展的脉搏，尽可能及时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广阔的思考空间，以应和我们这个已经开始走向多元的时代；打开窗户，迎接八面来风，交流信息和体验，提供多方位的思考，以期及时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

我们的三套女性读物正陆续与读者见面。欢迎阅读，欢迎评论，欢迎提供新的选题和建议。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年7月

目 录

目
录

| | |
|--------------------------|-----|
| 导论：女性主义在中国 | 1 |
| 一、中国男人如何阅读“男性解放” | 18 |
| 二、男人不是天生，而是后天塑造出来的 | 48 |
| 三、气功：女性空间的自我拓展 | 111 |
| 四、公厕：身体权力的性别检讨 | 130 |
| 五、旅游：“贤妻良母”的自主策略 | 147 |
| 六、“他妈的”：粗话背后的性别政治 | 178 |
| 参考书目 | 201 |

导论：女性主义在中国

1999年初，笔者参加北京一个女性主义研讨会。一位刚从美国参加国际妇女会议的妇女在会上汇报成果，言谈间流露出极大的(性别、国家、文化与民族)身份焦虑。她说临行前中方官员叮嘱她要注意“中国妇女”(在国外)的形象。她作为中国妇女的“代表”，确实希望把中国妇女的甜酸苦辣与国外妇女分享。但，应该说多少、如何说、用什么身份来说，令她十分烦恼。她在国家与女人、GO(政府组织)与NGO(非政府组织)中把持不定，但更大的焦虑却来自国外女性主义者的目光。她反复说：“幸好，她们(西方妇女)没有批评我们的发言。”她最关心的，似乎不是自身要说的话(主体声音)，而是西方白人妇女对她的评价(殖民视角)。虽说是中国代表，实则却用西方白人的眼光与标准来衡量自己，渴望对方的确认，严重缺乏自信之余更进一步强化“西方优越，中国落后”的殖民论述；甚至不自觉地成为东方主义 Orientalism 的帮凶，把“中国妇女”定格凝固为“无助无知”、“亟待拯救”的受害者，仿佛中国妇女必须依从西方

妇女的经验才能自我解放。如此西方中心的解放模式，自然把中国妇女定位于“从属”西方的弱势位置。

西方白人殖民霸权固然昭然若揭，但文化殖民得以顺利开展，还得依仗被殖民者甘之如饴之悉数全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边中国人高扬“向西方说不”的民族自尊，那边义和团情结借尸还魂，貌似排洋排外，实则迷失自我，处处以西方标准来衡量自己；既反美却又崇美，把“西方”等同为美国，把美国骂同为“文明”与“进步”的代表，甚至必须“出口转内销”，以民族卖点“扬名海外”，才能在国内独占鳌头。

中国“代表”在西方世界的两面不讨好，正好是中国女性主义的独特处境——她们不可能像西方激进女性主义者那样把“性别”从社会文化处境中抽离视之为跨文化跨历史的产物，更不能凭借自身的（白人）种族、（西方）文化与（中产）阶级特权，而认为（父权）性别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中国妇女运动衍生自反殖、反帝、反封建、反资的国家民族运动，故从不会把“性别”从国家、民族、社会、阶级或人伦宗族中抽离出来，而追求个人性别解放。相反，却一直面对着殖民主义、国家机器、封建宗族制等多元多重战线，绝少把男人视作敌人，反而处处与男人并肩结盟作战。许多国外女性主义者，从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抗衡政府的视角，批评中国妇女运动与组织是“从属国家”、“为政治服务”而丧失自身的自主性。但，笔者认为，国家与妇女的关系固然不是平起平坐之对等，过去几十年的妇女运动总与国家政策直接挂钩甚至依附，而如果单轨直接、片面僵化地把“中国妇女”还原为“国家”的附庸甚至工具，这不但把“中国妇女”单

一化和概念化，也漠视中国妇女长久以来积极在国家论述内寻找并发展起来的自身空间。正因中国妇女运动从开始便被纳入国家民族自强救亡历史运动中，既非“独立自主”的性别论述，也从不以男人为敌人，这其实令中国妇女运动与女性主义从起点便超越“男压迫女”的唯性别论，把性别议题放在偌大的人伦、宗族、家国、社会脉络里，充分利用家与国论述之丰富资源，作自我壮大以至安身立命之基地，清晰地以人性解放而非个体或性别解放作为妇女解放的终极目标。这无疑给予妇女运动和女性主义以更豁达壮阔的社会视角。妇女学者李小江就表示不能认同西方女权主义，因为与中国妇女解放出自完全不同的根系：

“我(们)所接受的妇女解放思想，源出自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它的基本出发点是‘阶级’阵线，而不是以‘性别’划线……无论马克思主义在妇女解放理论中有着怎样的缺陷，比较女权主义，它给了我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更博大的胸怀，更高远的思维起点……中国的妇女解放是女人和男人共同奋斗的结果，相比之下，男人的贡献甚至可能大于女人自己所做出的努力……(西方)女权主义就是用妇女的观点、妇女的立场、妇女的角度去批判男性文化。它把历史界定为男性的，然后加以批判。我的角度更倾向于文化、社会和历史，在对待男性的态度上比较温和，也比较公正。这个‘公正’的背景不是出于我个人，而是因为中国‘五四运动’以后和 1949 年以后妇女解放道路，是男女共同参与的。男性中心的并不一定是男性的，这是我和西方女权主义一个很主要的差别。她们往往把男人和女人看做对立面，好像两个营垒。我从女性的角度出发，对男性中心，我

是批判的,但不是对立的。”(1997: 61~62,241)

拒绝把“性别”抽离于社会人伦网络而作本质化的男女二元论,其实不仅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偏好”,也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人观”一脉相承。中国传统文化从不把“性别”视作为独立自主的论述系统,不论女或男皆不是超越社会而存在的本体,而是从出生就被纳入偌大的人伦宗族体系,并以其中的具体人伦角色位置来界定每个人的首要身份。若把所有人伦与社会角色也拿走,“人”也消失了,变成不可理喻的“非人”。换言之,所有“个体”必须在人伦宗族里找到某个位置,才能安身立命成为完整的人。白露(Tani Barlow)在《妇女观的形成:妇女、国家、家庭》里,引用清朝官吏陈弘谋在《教女遗规》“序言”中一段话:“夫在家为女,出嫁为妇,生子为母。有贤女然后有贤妇,有贤妇然后有贤母,有贤母然后有贤子孙。王化始于闺门,家人利在女贞”。白露指出,在这段话里,根本没有抽象的“女人”,只有不同人伦位置下的女、妇、母、贤女、贤妻、贤母、贤子女;而这些人伦角色皆紧扣相连而非孤立自主。

中国阴阳乾坤宇宙观虽明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周易·系辞上》),但阴阳是衍生万物的宇宙观,不一定指涉女男;而且阴阳关系乃流动变化、互动互补、调和合一,按独特处境而衍化,与西方哲学本体论的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观截然不同。

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建构与划分性别的模式,“性别”并不必然只分两种。按中国《周易》,每个人都是阴阳乾坤六十四卦的某种独特时空组合。道教强调每个人都是一个阴阳调和的小周天小宇宙,独阴不生、孤阳不长。每个人的

阴阳互动组合都不尽相同，难以简单被男女二元对立所概括穷尽。传统中国文化更从不按性伴侣的性别来划分性身份、性取向，没有同性恋与异性恋的二元对立，也从不把同性恋或异性恋视作对立的性人种，甚至 sexuality 这个英语概念，至今也没有恰当的汉语翻译。因为传统文化根本不会把“性”视作抽离人伦宗族、阶级与社会位置而独立存在的论述对象和范畴。

即使在西方世界，不单“性意识”、“性身份”等都是 19 世纪工业革命以后才衍生的社会观念，女男二元抽象本质化的对立，也是 19 世纪以后的事。西方学者 Randolph Trumbeah 在 1989 年出版的《现代西方文化的社会性别与同性恋角色》中指出，18 世纪英国正从两种社会性别（女性与男性）、三种生理性别（女、男、雌雄同体）过渡为四种社会性别（女性、男性、肛交者与〔女〕同性恋）及两种生理性别（女与男）。而 Thomas Laqueur 在 1990 年的《制造性事》中指出，18 世纪欧洲才出现超越阶级与宗族的本质主义生物性别决定论，就是说把生理意义的“男性”等同为社会角色的“阳刚气”，把生理意义的“女性”等同为社会角色的“阴柔气”。在 19 世纪以前，男女身体根本不会被对立化，都是以男人的身体为标准而把女人视为男人的“缺憾”的“小男人”与“次等男人”。到 19 世纪自然科学与理性主义渐成为道统，崭新的生物解剖学与生物学才把男女界定为各具本体特质的二元对立。不幸的是五四运动知识分子正好在“全盘西化”的氛围下接受了这套“性二元论”，产生了以生理性别为内核的“女性”与“男性”观念。虽然“女性”一词，承继西方启蒙运动的自由、平等、个体解放精神，因而策略性地颠覆

中国封建家长制。但“女性”超越人伦宗族枷锁之余,却又马上被束缚在西方达尔文生物决定论及性学家“男理性坚强、女感性柔弱”的性二元论述。难怪在西方充满“社会建构主义”含意的 gender, 被翻译为中文, 却变成毫无社会文化建构含意的生物决定论词汇“性(差)别”。故此近年国内女性主义者开始把 gender 译作“社会性别”, 不但强调社会文化如何塑造与建构“生理性别”(sex), 同时亦把“社会”放在“性别”前面, 凸显“性别”所置身的社会脉络, 也是对西方“唯性别论”、“性中心论”和“男女二元对立”的后殖民颠覆策略。社会性别一词虽然是对国内根深蒂固生物决定论之当头棒喝, 但代价却是建构出 gender 与 sex 的二元对立, 把性(sex)与身体(body)塑造为不受社会文化建构过程所影响的纯生物学现象。

在传统中国, 性别并非孤立自存, 而是与阶级等级与长幼年辈构成三重身份等级制(参看杜芳琴, 1998)。性别、阶级与年辈之间, 并非外在表面的附加关系, 而是内在渗透式互为建构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即是说, 不是把人先分女男然后再分阶级与长幼尊卑年辈, 也不是把阶级、年辈与种族差异“附加”在性别之上, 相反, “性别”本身同时也包含着阶级与年辈元素。正如没有不划分性别与年辈的阶级身份, 也不能抽空既有性别与阶级秩序而空谈长幼年辈。换言之, 每个人都占据着多元多重甚至互相矛盾的社会位置。例如女奴仆与男贵族主子间, 本是性别与阶级皆一面倒的尊卑分明, 但当女奴仆是抚养男贵族主子的“奶妈”, 其长幼年辈就令她俩间的权力关系异常复杂。即使同样的阶级与性别处境, 一生的不同年辈角色(如为人女、妻、媳、母、婆

婆)就代表着截然不同的主体权力位置——尊母崇母的至高无上,相比于女儿在性别与年辈上的双重弱势,就不能同日而语。阶级、年辈与性别,皆不能定于一尊,也不是截然割裂的“外在”关系;三者之高低先后等次,按特定处境之权力拉扯而此消彼长,不一而足。

虽然男尊女卑、男主女从,乃渗透社会各阶层的封建道统。但中国传统“关系本位的人观”,令“性别”甚少是社会身份的中心。相对于中国传统以“家”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现代西方社会以个人权益为本,高度强调个人空间与人权,“伤害原则”不单是西方法治精神的基石,也是整个西方现代社会的基本生活信念——除非我伤害了你,否则任何人无权干涉我,包括母父。现代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本,加上男女二元对立被笛卡儿理性主义、康德道德哲学,以至整个启蒙运动提升为现代西方哲学的本体,因而令两性关系成为极度敏感、高度对立的权力抗争。其优点是男与女的“性人格”在青春期就茂盛开展,人权意识强烈,女性绝不容自身权益被男权剥夺,因而开显出激进的女性主义。但,只知从“男压迫女”的角度把女男关系定位定格,一味从权力分析来理解丰富多元的人际关系,自然你我疆界严格划分,甚至性战一触即发。而崇性文化更令男与女皆异常强调性魅力,甚至视之为人格与价值的重要指标,终生执着于性表现与性吸引的自我与权力游戏,令性变成沉重的表现压力,仿佛到20岁仍未有性经验,必须寻求心理辅导,到25岁仍未有性高潮,就心理有问题。而美国文化更成为当今最强调女男性征与性魅力的文化。

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却趋向“非性化”。这不是指

19世纪维多利亚式把性欲加以抑制与打压,而是根本从不培育“性人格内涵”,甚至连一切七情六欲的个人感情表达皆刻意回避:干掉私隐,令个体依附家、国;性事必须为集体服务,完全“非个人化”;独立于人伦宗族的 *sexuality* 根本不存在;两性性征不被强调,男与女在阴阳调和的理念下,向较温和阴柔的方向发展。虽则女卑男尊乃两千年沙文道统之泰山压顶,但女男皆服膺于封建家长霸权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同样束缚着女男:女人受制于三从四德、夫为妻纲;男人也只是母父的私人财产,父为子纲,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这也是阶级、年辈、性别三轨制的必然结果——族权经常能驾驭父权,令家长成为至高无上之权威。

1949年后,非性文化在男女平等之大一统旗帜下,被推上极端的台阶。女男差异被否定,共同穿着阔大、深蓝墨绿衣服,女人一样走进矿场石场担泥掘地,并以与男人看齐为荣。故所谓女性特质与身份,竟最被女人所轻蔑贬视。李小江就多番指出她自幼就不认同“女人”:

“我知道自己是女人,但并不认为它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不知道它与‘人’、与男人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当时,如果有人提出要搞妇女研究,我自己恐怕就是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我)极端鄙视女性,决心与‘女人’分道扬镳……少年时候的我,就是决心要跟‘女人’划清界线的”。
(1993: 2, 19)

“我原本是轻视女人的,在我的思想中,有中国、有世界、有全人类……惟独没有女人。在我企图钻研的学问中,有历史、有哲学、有文学、有美学;有马克思主义、有社会主义、有启蒙思想、有现代派……就是没有妇女”。(李小江,

1997:237)

在那个“男女平等”的年代，女人鄙视女儿气是极普遍的状况。譬如刘伯红在《女性的反响》中就深刻道出这种态度：

“我当过 24 年军人，原来并不在妇联工作。我开过一个玩笑，说我是从一个找不到女厕所的地方到了一个找不到男厕所的地方。我当兵的时候，曾经看不起女性，觉得她们把人类的一些缺点都集中起来了。我曾为我与女人不同而自豪：有人说我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男人没有把我当成‘女人’，而是平等地把我当做合作者，当成竞争对手。对此，我多少有些赞许，觉得自己至少没染上这个性别的毛病，那时，我以不认同我的性别为荣。”(1995:224)

在 90 年代，许多中国女人仍不太自觉甚至不认同“女人”这个性别，先后在国内的名牌大学毕业的年轻成功人士 Jane 在 1999 年第三期《Welcome to China》中就表示：“惟独那次离开(外资企业)办公室时男士为我开门，我才察觉我是个女人。平时我只自觉是工作上的员工，而非女人。”文章作者说：“在她年幼时，Jane 的父母把她抚养为一个将来必成大器的人，而不是男孩或女孩。”

李银河在《中国非性化与妇女地位》中指出：在西方，一个女人首先是一个女人，其次才是一个人；而在中国，人们见到一个人，不会首先想到她是一个女人，因为她身上女人的特征并不比她们职业特征(是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教育程度(“有文化”还是“没有文化”)或性格(开朗还是内向)之类的特征更引人注意……西方社会中的女权运动是那么如火如荼，西方女性在谈起妇女地位问题时是